

# 河西走廊聚落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蔺慧媛 李鸿飞 兰州理工大学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和道路交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解读河西城乡聚落空间形态的演变特征，提取文物保护单位和文化遗产点信息，梳理出河西走廊文化遗产资源的分布特征，从宏观层面阐述遗产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对研究聚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聚**落文化遗产是聚落与自然、社会长期相互作用并进行生产生活等活动的产物，包含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体现了聚落的集体文化认知、倾向、特征，并提供文化服务、输出文化获益的空间<sup>[1]</sup>。河西走廊（Hexi Corridor），因位于黄河以西，为两山夹峙，故名河西走廊。其位于甘肃西北部祁连山以北，合黎山以南，乌鞘岭以西，甘肃新疆边界以东，形成长约10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200公里不等的长条堆积平原。它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丝绸之路西去的咽喉所在，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富足之地、兵家必争之地。悠久的历史让河西走廊拥有众多古遗迹、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等物质文化遗产，充分体现了河西地区的文化特色，而民俗、歌曲及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聚落普及和传递当地文化认知的载体。

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国内外学者从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多维度地研究文化遗产，研究内容主要

集中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文化与旅游发展模式、文化空间营造和非遗艺术价值探究等方面。河西走廊拥有丝绸之路西部地区最丰富的文化资源，现存62处遗产。本文从城乡规划学的视角对河西走廊聚落的空间形态特征、文化遗产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旨在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文化旅游的发展以及城乡人居环境建设提供思路。

## 河西走廊聚落形态演变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向西的咽喉，对我国经济、文化、交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国际化发展。河西走廊南部为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的祁连山脉，由一系列西北-东南走向的高山和谷地组成，西宽东窄，以柴达木盆地至酒泉之间为最宽，长约300公里，同时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功地阻挡了风沙入侵，从而形成了大量的洪积平原和冲积平原。河西走廊虽属大陆性干旱气候，但是祁连山有着丰厚的永久积雪和史前冰川覆盖，这些积雪和冰川在每年特定的季节融化，

【基金项目】1.2020年度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河西走廊祁连山地区聚落生态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编号：20ZC13）；2.2021年兰州市社科规划项目《黄河流域兰州段生态空间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研究》（编号：21-014B）；3.甘肃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互联网+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镇规划实践类教学创新研究》（编号：GS[2018]GHBBK066）；4.甘肃省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工程项目《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的甘肃省乡建人才就业创业实训中心》（编号：902017）；5.兰州理工大学科研发展引导基金《祁连山河西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与生态保护耦合共生研究》（编号：2020A17）。

【作者简介】蔺慧媛（1996—），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李鸿飞（1977—），男，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城乡空间形态与文化遗产保护。

为河西走廊大量的绿洲和耕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绿洲才得以繁衍生息,从而形成现在的城乡聚落,记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农耕文明。

聚落空间形态不仅影响着景观格局和生态环境,而且对历史遗留的文化遗产作用深远<sup>[2]</sup>。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条内陆河流经于河西走廊,从而由东至西衍生出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和嘉峪关五个城市。总体来看,河西地区聚落形成了沿水系聚集的串珠形空间格局,各聚落分布的密集程度以城区为中心向四周递减。从河西五市的城市形态来看,武威是河西走廊最东端的城市,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冲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石羊河水系流经此处为城市带来了生机。武威市聚落空间呈现出以同心圆模式向外扩张,由“轴向延伸”到“环状填充”的空间扩展特征<sup>[3]</sup>。金昌地处中国西北地区、甘肃省河西走廊中段,因盛产镍被誉为“祖国的镍都”,因而金昌因矿而建,因矿而兴。金昌市聚落空间相对发展缓慢,城乡规模较小且总体布局较为紧凑,城市用地表现为由老城区向外扩展<sup>[4]</sup>。张掖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商贾重镇和咽喉要道,城市依靠黑河水资源发展建立,绿洲作为灌溉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过程影响着流域绿洲城市的变迁。加之历史上其受气候因素的影响,使得下游绿洲城市逐渐向中游甚至上游转移,逐渐在河流中上部发展,由聚落发展成为了今天的城市<sup>[5]</sup>。酒泉聚落空间形态上呈现先向心集聚扩张,后持续离心轴向扩张的过程。主要功能用地分布的空间结构由L形演变为T形<sup>[6]</sup>。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从空间上看,嘉峪关城市扩张主要发展方向是东南和北面,先是向环城铁路内戈壁荒滩以向内填充扩张,再向环城铁路外扩张<sup>[7]</sup>。

交通因素对乡村早期的空间格局影响较小,聚落封闭式发展导致了其功能上的差异<sup>[8]</sup>。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社会对政治、军事的影响日益增大,各地区自然环境的特殊性以及聚落功能的差异,也往往在同一地区趋同或共存。与城市空间相比,村落形态更明显地呈现出沿地势、道路及河流分布的走向。武威和金昌周围有多条交通要道,村落以现有中心村镇为核心在其基础上向四周扩展,呈现出点状集中式的内向性群体空间形态。在张掖虽然各个村镇边界均有其独特的扩张方式,但其主体扩张方向还是主要沿着道路发展或在道路两侧发展,整体空间形态特征呈带状分布。酒泉乡村聚落的发展主要是依托交通道路,村落主要通过开发农业用

地沿城区T形结构向四要道沿线以及河流、沟渠附近,呈鱼骨状形态发展,并在开发农业用地的基础上向四周扩张延伸,其中南北两个方向扩张最为显著。嘉峪关乡村聚落主要呈现为在空间上向东南、西北方向扩张,且扩张土地主要是通过开发荒漠区获得的。

### 聚落文化遗产资源分布特征

河西走廊现有遗产资源类型丰富多样,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为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更是见证了河西文化的诞生与发展。在河西走廊区域内的6类文物保护单位中古遗迹类所占比重最大,共89处,占比41.59%,其中国家级20处,占比9.35%,省级69处,占比32.24%。其次为古墓葬类,共有47处,占比21.96%,国家级共7处,占比3.27%,省级40处,占比18.69%。古建筑类排第三,有41处,占比19.16%,其中国家级有12处,占比5.61%,而省级有29处,占比13.55%。石窟寺及石刻类排在第四,共有21处,占比9.81%,其中国家级有9处,占比4.21%,省级12处,占5.61%。近现代重要史迹类排第五,共有15处,占比7.48%,国家级2处,占比0.93%,省级有13处,占比6.07%。其他类别下的仅有一处省级文保单位,占比0.47%。从214处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来看,酒泉拥有数量最多,共有78处,占比36.45%。武威次之,共60处,占比28.04%。张掖排在第三,有56处,占比26.17%。金昌排第四,有16处,占比7.48%。嘉峪关相对其他地级市较少,仅有4处,占比1.86%。

河西走廊遗留了50处物质文化遗产与12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从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来看,酒泉数量最多,共有78个,占比36.45%。武威次之,共60个,占比28.04%。张掖排在第3,有56个,占比26.17%。金昌排第4,有16个,占比7.48%。嘉峪关相对其他地级市较少,仅有4个,占比1.86%。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来看,武威和张掖拥有数最多,各拥有四项非遗资源,各占33.33%;酒泉拥有数量排在第三,共有3项,占比25%;金昌排在第四位,有1项非遗资源,占比8.34%;嘉峪关则没有。

从总体来看,河西地区文化遗产资源分布不均衡,其原因在于聚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近水性和各城市整体发展具有差异性。此外,由于祁连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从而形成了一大批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河

西地区传统聚落发展演变中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因此,对文化遗产分布特征进行研究,能够为聚落空间营造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居民的文化价值内涵,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和弘扬地域特色文化。

### 河西走廊聚落文化遗产分布影响因素

河西地区文化遗产分布不均与其文化遗产的分布、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密不可分。在自然地理环境下,聚落主要聚集在河网发达、降水充沛、气温适宜等自然地理环境下,此类区域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村落的生产与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时社会经济条件因素主导了聚落延续和文化遗产,对国土空间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文化遗产的分布规律与聚落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聚落的发展主要依托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等因素<sup>[9]</sup>,为人们提供和创造适宜的居住环境,因此影响河西走廊文化遗产分布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环境。地质和地貌是极为重要的地理环境要素,而坡度高程对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也有着深远的影响<sup>[10]</sup>。河西走廊是冰川融水形成的堆积平原,平坦的地形有利于人类聚居,从而引导生活生产、文化交流等活动。此外,祁连山生态屏障对风沙侵蚀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地带性植被以超旱生灌木、半灌木荒漠和超旱生半乔木荒漠为主,能够有效地稳固土壤,防止大量水土流失。聚落的形成多与河网交错地带密切交织,不仅能满足生存需求,还可开展各种农牧业生产以实现自给自足,因此河流是人类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这就为河西地区聚落的形成与演化奠定了基础,使聚落文化得以保存与传承。

社会经济因素主要包含经济发展、人口数量、民族宗教、道路交通等因子。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河西五市常住人口总数为440.2万人,其中武威市146.5万人,金昌市43.8万人,张掖市113.1万人,酒泉市105.6万人,嘉峪关市31.2万人。甘肃民族地区7个自治县,河西走廊占4个,分别是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另外,民族宗教信仰也同样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文化资源分布。作为多民族的聚集地,聚落承载了多元性民族文化。从河西走廊少数民族分布情况来看,藏族主要聚居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和河西走廊祁连山的东、中段地区,而裕固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祁连山的中、西段地区。除此之外,交通区位条件的差异成为影响区域聚落发展的重要因素,聚落多分布在路网密度处于中等水平的区域。道路

的可达性不仅可以使聚落适应城乡现代化发展,也能保障自身文化不受损害。同时,绿洲环境、政策制度、社会经济以及交通廊道等因素共同作用构成聚落空间形态演变及文化资源分布的驱动力。

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路段,连接着亚非欧三大洲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激荡,积淀下蔚为壮观的历史文明。解读河西聚落文化资源现状,对于丝绸之路文化未来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推动全球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将有助于河西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开发,探索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文化遗产与融合发展提供思路,对聚落空间文化融合与丝绸之路沿线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王琳瑛.乡村文化空间形塑及其发展政策义涵[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9.
- [2]李鸿飞.传统聚落空间形态保护与发展研究[D].兰州:兰州理工大学,2018.
- [3]周在辉,任云英,武威.1990—2016年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分析[J].工业建筑,2020,50(07):120-126.
- [4]何倡,陈晓键.不同类型中小城市空间扩展特征研究——基于敦煌、金昌、张掖的分析[J].现代城市研究,2017(01):111-118.
- [5]梁峰,石培基,李骞国.河西走廊绿洲城市空间扩展及驱动机制——以张掖市主城区为例[J].开发研究,2018(02):142-147.
- [6]刘海龙,石培基.绿洲型城市空间扩展的模拟及多情景预测——以酒泉、嘉峪关市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17,32(12):2075-2088.
- [7]刘奔腾,李玉芳,王任之.丝路视野下城市历史环境保护研究——以嘉峪关市为例[J].南方建筑,2018(05):81-86.
- [8]李鸿飞,何颖茹,唐琇尧,等.中国传统村落木结构建筑防火研究[J].林产工业,2020,57(10):60-64.
- [9]高靖易,侯光良,兰措卓玛,等.河西走廊古遗址时空演变与环境变迁[J].地球环境学报,2019,10(01):12-26.
- [10]朱陇强,王晓云,刘佳敏,等.甘肃河西地区历史遗址分布及其自然环境背景[J].中国沙漠,2021,41(04):121-128.